

Uses of Epidemiology”,以及关于医学生公共卫生教学的一篇文章。他也从不翻译别人的书,总是认为要读就去读原著。他绝不随意在别人的文章上署名,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我将研究生毕业论文整理后发表,他是我的导师,文章中有他署名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却被他拒绝了,说:“你做的东西我不懂,我就不必署名了”。这句话既让我感到些意外,又使我真正认识到这就是何教授。

我虽不“惧怕”何教授,但在他“放羊式”的研究生培养中,真的领会到这段貌似“自由”学习的艰辛,

也对其学术的严谨和严格深有体会。当完成研究生学业后,我曾发自内心地说,过了何教授这一关,今后有多难的事情我都不怕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研究生经历确实为我今后教学和科研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跟随何教授学习流行病学的经历让我感慨良多,回味无穷,也使我毕生心存对他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收稿日期:2011-01-12)

(本文编辑:张林东)

学习何观清教授的高尚情操

俞顺章

时间飞逝,转眼间,何观清教授离开我们已经有了15年了。我与何教授的接触虽然不多,但他却影响了我对事业的选择。何教授和我叔父俞焕文教授均是前协和医学院毕业生,也是相交多年的老友。20世纪50年代初,我叔父曾与他并肩奔赴朝鲜参加反细菌战工作,两人都获得朝鲜人民共和国勋章。那时,我还在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临床医学。何教授和我叔父路过沈阳时,我曾到东北旅馆拜访过,听他们介绍了一些在朝鲜利用流行病学方法调查和防制细菌战的情况,这对我后来选择公共卫生作为毕生事业有很大影响。

同为我国流行病学界的泰斗、我的导师苏德隆教授佩服的人不多,何教授却是其中一位。苏教授曾对我提起过何教授“创立了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学基地、开启了中国慢性病研究”,并鼓励我们向他学习,搞好上海市教学基地和启东肝癌研究现场的建设。在“文革”后,苏教授主编的流行病学教科书中亦将“慢性病”列入其中。

何教授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令人钦佩呢?追忆何教授的科研传奇,在他身上值得当今科研人员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一、追求真理,敢于挑战权威

20世纪50年代,何教授应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现场实验的研究方法,对痢疾噬菌体疫苗预防痢疾的效果作出了科学评价,从而否定了当时“苏联老大哥”用这个疫苗来预防细菌性痢疾的做法。这一

研究成果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今天看来,作为我国流行病学界泰斗,有这样的研究成果好像很正常。可在那个年代,又有几个人能够像他那样顶住强大的政治压力去挑战权威呢?

当时的痢疾噬菌体疫苗是由前苏联援助引进的,而在那个年代,“苏联老大哥”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何教授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采用国内医学界当时还很少有人能接受的、来自西方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的方法,对痢疾噬菌体疫苗预防痢疾的效果作出了科学评价。后来,在调查国外引进的鼠脑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接种时出现的严重过敏反应时,他同样表现出了这种坚持科学、求真务实的治学品质。

反观当下,有些科研人员“缺乏调查研究、只按领导意图办事,甚至盲目地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这更彰显出何教授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对当下的现实意义。

二、治学严谨,理论结合实际

何教授根据对黑热病与白蛉分布关系的分析及婴儿必须经历一个“白蛉季节”才会发生黑热病的特点,明确指出在自然界中黑热病只有白蛉叮咬一种传播途径,控制白蛉就能控制黑热病。他的研究对当时争论不休的黑热病传播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还亲自在我国西北地区数省建立了36个黑热病防治站,为基本消灭黑热病做出了重大贡献。何教授毕生治学严谨,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 世纪 40—50 年代,他在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任教时,参与并主持了社区卫生示范区(北京市东单区卫生事务所)的工作。当时该卫生示范区不仅为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学习预防医学,学会从群体角度解决健康问题提供教学现场,也示范了一种医学服务与人群预防结合的模式,更体现了把“现场观察和现场实验”作为流行病学方法的理念;在他的教学生涯中,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他有许多学生虽然是该校培养出来的高级临床医生,但却一生从事预防医学,并且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何教授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控制人群疾病,增进公众健康,就要学好、用好流行病学,要深入现场干实事,推广社区卫生示范区的模式。

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思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何教授主持了四川省凉山彝族群高血压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用移民流行病学方法,发现当地彝族群高血压主要是环境因素的作用,而非遗传因素的影响。

“文革”后,他最大的一项贡献就是开创了中国的疾病监测工作,率先在我国 13 个省建立了 30 多个疾病监测点。该监测系统成为我国制定医学卫生发展规划和疾病控制策略的重要信息来源,也为评价很多卫生对策的效果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要学习何教授这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

四、坚持锻炼,增强身体素质

在多次同何教授与会的接触中,我看到他坚持晨练,还能做倒立、毯上运动,有时在游泳池畅游,在马路长跑,参加会议时也从不中断身体锻炼,这就是他能够长期保持良好体质和精力的原因。这也是我们这些从事流行病学研究的科研人员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只有保持良好体能,才能随时深入现场,应付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何教授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依旧闪耀着智者光芒,让我们把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延续下去,为我国的科研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收稿日期:2010-01-14)

(本文编辑:万玉立)

与何大夫一起做公共卫生

张德宣 陈立泉

在纪念何观清教授诞辰百年之际,我们也忍不住忆起了与他共事、向他学习以及在他的指导下工作的点点滴滴,因为那时北京市东城区卫生防疫站(现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有一定历史渊源和诸多联系。我们作为东城区卫生防疫站不同时期的工作人员、站长,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何大夫从事的部分公共卫生工作。

一、从第一区卫生事务所到东城区卫生防疫站

东城区卫生防疫站前身的一部分是东单区卫生事务所(解放前的第一区卫生事务所)。我(张德宣)是 1949 年到第一区卫生事务所工作的,当时的所长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裘祖源教授,不久何教授接任了所长。

那时北京市各区均有卫生事务所,是卫生局领导下的公共卫生机构。但是东单区卫生事务所非常独特,它虽然也接受卫生局的领导,但所有工作人员

均为协和医学院的教职员工(由协和医学院支付工资),工作内容也是由该校公共卫生系设定,是为东单地区居民、学生及工人提供防治一体化服务,同时还是协和医学院学生公共卫生实习基地。卫生事务所工作人员要下现场进行孕妇产前及产后调查、接种疫苗,要到工厂、学校等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我(张德宣)就去过东单区内的贝满学校给学生体检,为初三学生讲授生理卫生,这些均是公共卫生工作需要做的内容。在社区工作中若发现患者就介绍到卫生事务所(医生均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进行诊疗(其他的卫生事务所均没有门诊)。

1956 年,我们学习前苏联模式把东单区卫生事务所分为东单区卫生防疫站、东单区结核病防治所和东单区妇幼保健站。我(张德宣)任东单区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当时没有站长),一任就近 30 年。防疫站成立后的工作与第一区卫生事务所有非常大的区别:防疫站变成了行政单位,工作人员只去现场检查而不解决问题。防疫站做得最多的就是搞爱国卫生运动,当时连医学院毕业的大夫们都到居民家里查